

人生事 總堪傷

海上名媛保志寧回忆录



汤涛 编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人生事 總堪傷

海上名媛保志宇回憶錄



張鴻 編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人生事 總堪傷

海上名媛保志宁回忆录

汤涛 编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生事, 总堪伤: 海上名媛保志宁回忆录 / 汤涛编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458-1575-7

I. ①人… II. ①汤… III. ①保志宁—回忆录 IV.
①K8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1954 号

责任编辑 王 璇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酆书径

人生事, 总堪伤——海上名媛保志宁回忆录

汤 涛 编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mm 1/32
印 张 8.875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1575-7/K.300
定 价 35.00 元

作者弁言

在创作保志宁回忆录工作之前，我曾花费数年潜心发掘和研究其丈夫王伯群先生。

在星河灿烂、风起云涌的中国近现代史上，王伯群先生无疑属于名留青史之人杰。

对我如此勤力地去研究王伯群，一位挚友有些不解，接连抛了三个问题：

1. 为什么要研究一个被历史尘封的人物？
2. 王伯群有何历史事迹和功绩，值得你去追念？
3. 曾轰动上海、波及全国的“王保婚姻”风波，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想，通过答疑解惑来回答友人的提问，也许是读者有效了解王伯群、保志宁和民国那段历史真相的诚实且嘉巧的方法。

研究王伯群先生，用简白两个词来表达，即缘分和责任。

王伯群先生是华东师大前身大夏大学创办人和校长。基于其母校校长身份，我对其一生事迹充满了好奇和亲近感。十年前，我曾对从江右鄱阳瓦屑坝出发的“江西填湖广”的移民史产生过

浓厚的兴趣。王祖籍江西，其世祖王玺于明朝末年随定南侯景双鼎平黔乱，最后落户黔西南兴义县景家屯。作为赣地子民，自然对王伯群家族的移民个案如获至宝。诚然，诸上所言只是一种情怀，真正至为重要的是，发掘被史学界遗漏之人物，且又是推进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这对研究者来说，其中之欢喜，无异于发现藏宝图。

这就是我为什么着力研究王伯群先生的基本动因。

接着，我拟用写意笔法介绍下王伯群，算是对友人第二问题的答复。

作为民主革命先驱的王伯群。一八八五年，王生于贵州兴义。光绪末年，留学日本中央大学，加入同盟会后，结识了他人生中最重要四位友朋：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和蒋介石。迨辛亥革命后，个体高壮的王即返国抵沪，开始了他风云激荡的传奇人生。王有几大历史功绩值得记录：一是以贵州护军使代表，与蔡锷、戴戡等积极策动“护国运动”，领导贵州独立，终使袁世凯败丧，共和重光；二是追随孙中山直接参与“护法运动”，任广东军政府署理交通部长；三是参加南北议和，和平统一，与孙中山安危与共。

作为政治家的王伯群。一九二七年四月，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王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招商局监督。在交通部长任上，策远谋，弭大患，精诚弥耿，以民族主义者姿态，力行废除德日美等不平等条约。先后担任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中央政治会议委

员、国府委员、川滇黔视察专员和国史馆筹委等。一九四四年五月，国民政府颁予勋章，以表彰其政绩。

作为著名教育家的王伯群。王先后任交通大学校长和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长。一九二四年，捐资创办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担任董事长和校长。王殚精竭虑，在其执掌下，大夏拥有上海、贵阳校区，并开设香港分校；同时创办上海大夏附中、光夏中学、贵阳附中、南宁附中和重庆附中，大夏被誉为“东方哥伦比亚大学”。

在出版《王伯群与大夏大学》之前，王伯群先生的平生事迹，读者一般在网上所能搜索到的就是广为谬传的“王保婚姻”之轶闻。八十余年前海上坊间流传“大夏校花”保志宁一九三一年嫁于王之前，曾提出过三个条件：第一，赠其嫁妆十万元；其二，婚后供其出洋留学；其三，为其购置一幢花园别墅。这三个条件被《生活》周刊等媒体报道后，经《大公报》大肆演绎，众口铄金，推定王有贪腐之行为。一九三一年底，王辞去交通部长，引起社会一片哗然。时人谣称王是“娶了一个美女，造了一幢豪宅，丢了一个官职”。

史实真相果真如媒体和坊间所传吗？王伯群是确有贪腐受贿其事？还是捕风捉影、以谬传谬？

档案是证伪和证实最有力的工具。笔者剥笋锤定，在对相关档案史料进行爬梳和考证后发现，王伯群辞任部长一职，其实跟国民政府改组有关，与涉嫌贪腐无涉。

一九三一年，由于国民党宁沪粤相互争权，最后三方妥协，国民政府决定改组。十二月二十八日改组时规定：五院院长、副院长及所属各部部长、委员会委员长不得兼任国府委员；现役军人不兼任国府委员。十二月三十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由于政府改组，原各部部长都相应辞职，新任命的部长均非国府委员。顾维钧、宋子文、孔祥熙、王伯群等都因已当选国府委员，辞职后均不再履新。只有何应钦，因其为现役军人，又非国府委员，故仍担任军政部长。

报刊误传王伯群愚园路洋楼价值达 50 万元，为辛丰记营造厂行贿之物。辛丰记为何贿赂王伯群呢？报刊推断皆因该公司通过王承建了南京交通部大楼和大夏大学群贤堂教学楼业务。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国民政府完成《首都计划》，交通部在规划之列。一九三〇年七月交通部以建筑邮电部大厦的名义筹建，但由于地基变更、一九三一年的大洪水以及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的影响，直到一九三四年年底才竣工。彼时王已不再执掌交通部。辛丰记巨额行贿一位编外人，怎么想都觉得匪夷所思。

大夏大学一九三二年一份历年资产统计显示：中山路校地 300 亩，总价值 30 万；群贤堂、群策斋、群英斋、图书馆、实验室以及劳勃生路洋房等十七栋大楼，总价值为 57.1 万元。其中群贤堂，建筑面积 3 643 平方米，造价为 11.7 万元。中山路校区与愚园路同处苏州河上下游，两地相距不远，级差地价应该相差不大。两个数据一比较，读者就会发现，坊间关于愚园路占地

10.78 亩、主建筑面积为 2 158.8 平方米的洋楼，耗资达 50 万元的说法，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一九三三年八月，工部局要对愚园路新住宅收房捐，估价为 30 万元，确定每月房租 2 000 元，并照此标准缴纳房捐。王不服，拿出造屋和购地合同进行申辩，原来，合同约定造房价 5.8 万元，地皮 10 余万元，总价约 16 万元。

笔者从史料中还发现，大夏大学校舍建设，到一九三二年底捐款总额 38 万，其中王一人捐款达 17 余万。校内著名的 66.9 亩的丽娃河及周边的田地，是王从“面粉大王”荣宗敬手里募捐来的。王对大夏厥功至伟，其有必要靠介绍大夏一幢教学楼的业务而接受贿赂吗？似乎也不符合常理。

那么，至于王伯群何来资金建花园洋楼？他的另一个身份往往被大家所忽视，即王出身于名门望族，身家显赫。其研究生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专业，精通商理，擅理财，长于字画古玩投资。民国时期，居官、兴学、办实业，官学商集于一身是社会一种常态。早在一九一七年，王与祖籍江西临川的贵州大实业家华之鸿等成立群益社，担任理事长，创办裕黔公司，致力于发展贵州实业和矿业。两年之后，受贵州都督兼省长刘显世舅父授权，以贵州全权代表常住上海，从事经贸往来。居沪时，王还发起成立上海岭南银行，入股浙江实业银行，还大量投资实业、房产及火油等。由于其卓越的财政管理能力，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当选为江苏兼上海财经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九年被任命

为国民政府整理内外债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组织章程、权限范围，与美俄日英等大国债务谈判。他在担任交通部长时，于上海等地设立邮政储金汇业总局，除办理中华邮政的邮政储金、汇兑、保险、代收货价等业务外，同时经营买卖股票、抵押放款等银行业务。一九三七年，大夏西迁贵州后，王先后发起成立仁永两岸川盐运销处、聚康银行、聚康公司和利民公司等，发展西南经济，保证大夏办学经费所需。

上文所述，权作对友人第三个问题的析疑解答。

二

我之所以如此大费周章为八十余年前的一桩乌龙案证伪，是因为有一个人物怎么也不能绕过，她就是本书传主、王伯群第二任妻子保志宁。

在续娶保志宁之前，王伯群有位元配夫人周光輶，系其老家兴义周绍虞之次女，她比王大两岁，一九二八年不幸去世。他们唯一的儿子王实夫，在母亲去世的前一年染病身亡，年仅十八岁。

保志宁，一九一一年生于江苏南通，蒙古族。一九二七年九月从南通女师考入沪江大学，由于英文学习压力大，一年后，转入大夏大学社会学系，一九三〇年十二月毕业。在大夏副校长欧元怀和三叔保君建的引介下，一九三一年六月与王伯群结为伉

俪。她曾任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贵州分会会长、大夏大学校董。一九五一年迁居美国，一九九九年于纽约长岛仙逝。

保志宁与王伯群结婚后，主要做专职太太，在家相夫教子，留存于世的文字极少。除本回忆录外，仅有两篇追忆王伯群和王文华的手稿以及与何应钦、宋美龄、胡蝶和欧元怀的珍藏信函。为使读者更多地了解保志宁，编者在附录里收录王伯群的《余等婚事》、《永年轮土案呈中央党部》，贵阳伯群中学校长吴照恩的《代办贵阳王伯群故居过户记》以及笔者的《被遮蔽的王伯群》，作为本回忆录之补充。

本回忆录盖为三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 简述保家的家世、家族和家庭

保氏家族为蒙古族，澄清外界所传的满族之说。保志宁家学渊源，曾祖父保麟甫，擅词章，倾心于救济贫民和地方公益。祖父保少甫，是位饱学之士，与外交家、时任国务总理孙宝琦交谊甚笃，受孙影响，深感国家外交之重要。在祖父的教导之下，保志宁的父亲、叔叔和兄弟，大都投身外交事业。

保志宁的父亲保君崑，赴日本留学专攻外交政治。毕业后，从事外交工作凡三十余年，历任民国政府驻南非联邦约翰尼斯堡、新西兰惠灵顿、加拿大温哥华等地总领事。三叔保君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后，曾任上海特别市教育局长，悉尼、加尔各答等地总领事，秘鲁等国大使。保志宁的大弟保骏迪、三弟保紫宸分别在墨西哥大使馆和联合国工作。

保志宁十六岁只身从南通赴上海读大学，最后决定嫁给比他大二十六岁的王伯群，盖与她的家庭熏陶有关。外交家的家庭培养了她成为既新潮开放，又独立果敢；既勇于突破世俗藩篱，又坚守传统家庭祖训的新女性。

第二部分 追忆与王伯群的婚姻、事业和社交

这是本书的重点，也是核心内容。主要记述保志宁从五岁上小学堂，到四十岁时（一九五一年）独自携五个未成年子女移民美国期间的往事。

从一九三一年王保结婚到一九四四年王伯群重庆病逝，保志宁十三年的婚姻生活，夫唱妇和，琴瑟鹣鲽、快乐美满。王伯群致力于国务、政务和大学校务。尤其是一九三一年底辞任交通部长以后，全身心地筹谋擘划、殚精竭虑于大夏大学。在这十三年的婚姻中，她先后生育了二男四女六个子女（长子王祖泽十八个月夭折）。她们婚姻最幸福的时光，概在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之前的上海，她跟随高级官员的丈夫往来于宁沪，觥筹交错于宦宦权贵之间，尤其是上海愚园路花园别墅建成后，华屋锦食，过着相夫教子的阔太太生活。

保志宁出生，正值辛亥革命爆发的同一年，注定她的命运与这个跌宕起伏的时代生息相扣。迨民国成立后，军阀割据，政府纷迭，在时潮和国难的冲击下，红尘滚滚，地裂山移。一九三一年六月，当她与王结婚的时候，就锥心地体会到时代和社会对她的苛难。上海《社会与教育》、《生活》周刊和天津《大公报》对

她们婚姻的披露和攻苛，“王保婚姻”成为上海滩甚至全国性之谈资，一场正常的婚姻遭遇苛难和诋毁。此次事件之后，即使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一九八一年，保志宁仍耿耿于怀。当她首次从美国回到中国，在重庆修葺夫君的墓地时，有人劝他找政府解决问题，她仍然保持高度的警觉，认为私事就要私办，公私不要混同，当年伯群先生被抹黑，就是吃了这个亏。

作为国民政府高级官员的夫人，保志宁并不像宋美龄、陈璧君、沈亦云等夫人那样热衷政治，而是更倾心于家庭生活。她享受到了丈夫事业带来的福祉，体会到政府高层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同时也感触到了高层权力之间的倾轧和陷阱、争斗和觊觎以及离乱时代的欺凌和抗争、苦难和坚强。在回忆录中叙及或一笔带过的事情，往往都是惊爆于民国期间的大事件。

譬如“孙凤鸣刺汪事件”。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王伯群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汪精卫主持开幕词后，百名委员们赴会议室楼下大门外拍摄合影。甫毕，招待员大呼请上楼开会，王正要转身，忽闻枪声大作，他反身看见汪精卫中枪倒地。众人蜂拥而入，就将汪扶入楼下室内，没去参加合影的蒋介石急忙下楼探视。孙凤鸣刺汪事件，使此次会议草草收场。汪精卫随后辞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职务，蒋汪之间罅隙加大。经年之后，汪投靠日本，在南京建立汪伪国民政府，成为一代卖国巨奸。一九三九年，汪精卫占据王伯群在愚园路住宅（后被称为“汪公馆”），作为伪政府驻沪办

公联络处。尽管汪曾是大夏大学校董，王伯群在贵州，仍然通过广播台，对汪傀儡政府表达鄙视和愤怒，并大加讨伐。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淞沪抗战”爆发，王伯群因公务留在南京筹划大夏西迁和协助何应钦军事布署，日本遣令大批飞机沿沪宁路轰炸，车船交通中断。独自在上海的保志宁带着两个幼子、怀着身孕在炮火离乱中，匆忙撤离到香港。所幸的是，丈夫安顿大夏事务后，飞抵香港，带着保志宁母子经越南、云南长途跋涉到贵阳。一九三九年，保志宁亲历亲见贵阳“二四大轰炸”之惨烈：“晚七时方抵贵阳。我们看见全城精华尽毁，不胜惨伤之至。”史载，二月四日，日寇两批共十八架轰炸机对贵阳进行狂轰滥炸，仅仅五六分钟，贵阳之繁华商业区，瞬间被大火吞噬，遮天蔽日的滚滚浓烟，笼罩全城。当时贵阳人口才二十余万人，就有两万多人无家可归。

对于生活在贵州的保志宁来说，承担过一项重要的职务，即担任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贵州分会会长。从一九三八年五月贵州分会成立到一九四二年秋卸任，保担任了四年多时间的会长。但在回忆中，她对这段经历和取得的成绩着墨并不多，可见她的低调和谦逊。

全国保育总会由宋美龄担任理事长，地方均由省长夫人担任。贵州特别，由保志宁出面主持。担当会长是相当繁重和繁杂的工作，筹措经费、寻觅院址、组建队伍、教育管理、医药膳食等等，样样都要费时费力。在哺育四个孩子的重压下，保志宁利用自身优势，拢集了李新之、薛岳夫人、何辑五、欧元怀、李德

全、王文湘等要人担任分会理事，建立了贵阳青岩、定番、遵义的桃溪和团溪等四家保育院，同时在桐梓县建立直属保育院，收养保育一千余名难童。其中，贵州第一战时儿童保育院即青岩保育院，先后保育儿童六七百人，为抢救儿童、延续民族生命和抗战建国贡献了一份力量。

私立大学创办筚路蓝缕，至为艰难，大夏自沪迁黔后，办学经费更为拮据。一九三九年大夏拟改国立，提出过三种方案：（一）筑沪两校同时改国立；（二）筑校改国立沪校仍私立，教育部酌补助；（三）完全私立，加给补助费。大夏国立事件，前后四五年间，牵涉国民政府高层政要，如蒋介石、陈立夫以及校董何应钦、孔祥熙、孙科、许世英、张公权、吴铁城等，其中奥妙，可谓一波三折，波诡云谲。

一九四二年三月，王伯群突接教育部令，谓行政院讨论决定大夏改为国立贵州大学。王闻之大为愤怒，于是亲赴重庆，面晤陈立夫陈情游说，同时主持召开校董会对教育部施加影响。四月下旬，行政院正式决议：“大夏大学照旧维持，除原有补助费外，每年度加拨 50 万元。”保志宁回忆道：“伯群此行，得一圆满结果，很是欣慰。陈立夫对先生致歉意。”一九四三年三月，蒋介石视察贵阳，专门两次会晤王伯群询问大夏办学情形，王据实禀告。蒋提议“可用战区学生维持理由，再向政府呈请可耳”。王欣然认为蒋是支持大夏大学的。谁知九月，王赴重庆与会，孔祥熙告知曰：“介公自筑返渝，曾手谕陈立夫先生命将大夏和贵州

大学合并。立夫商敬之先生与孔先生，为大夏大学具函向介公解释后即无下文。”

从中管窥，为维护大夏生存，王可谓忍辱负重，苦心孤诣，鞠躬尽瘁。

第三部分 记述保志宁子女的成长、成才和成家

这部分内容相对简略。抗战胜利后，作为一名海上名媛，曾经的官夫人、阔太太，保志宁从贵阳、重庆回迁南京，然后重返上海收回愚园路房产。一九四八年底，她从上海随何应钦夫妇退居台湾。一年之后，漂洋过海到秘鲁，投奔三叔保君建。一九五一年再北上迁居美国。

丈夫逝世后，保志宁终身未再嫁。人生中年始，她在美国重新到商校学习会计。结业后，应聘到一家服装公司打工，独自一人养育五个子女，撑起一个家。在她的悉心培育下，五个孩子个个成才：长子王德辅担任芝加哥 Victor Comptometer 公司总裁，成为 5 000 多人大企业的总舵主。长女王德馨就职于 GE 公司；二女儿王德安在旧金山一所大学工作；三女王德桢从陆军牙科医院退伍后，就职一家著名公司；四女王德龄取得纽约大学博士学位，担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常务执行主席。

三

二〇一六年春，王伯群保志宁长子、八十三岁高龄的王德辅

先生受本人邀请，专程从美国回到国内，追寻父辈足迹，处理相关事务。在上海晤谈时，王德辅先生说他有“不情之请”，即希望由我来担纲，为他的母亲保志宁写本回忆录。他说，我主编的《王伯群与大夏大学》的出版，再现了父亲与大夏大学的一段历史，若能有本回忆录，再现母亲与父亲过去的那段往事。倘能如此，亦算是对父母、对家族、对母校和对历史的一个总结和交代。

我在感谢王德辅先生对自己的信任后，表示愿意做这件有意义的事，但同时坦诚地告诉他创作的困难：一是尽管手头收集有部分素材，但缺核心材料；二是相关人大都物故，无从访谈等等。王先生似乎早有准备，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他把父母亲遗留的中英文材料、笔记、录音、日记、书信和照片等珍藏资料摆在我面前，送与我供创作参考之用。在王德辅先生真挚而诚意的目光下，我决定接受这个“不情之请”。

在创作保志宁回忆录过程中，我主要着手如下工作：

（一）对英文资料、录音、日记等分别进行翻译、录入整理和分类清理。

（二）在创作过程中，为体现历史现场感和嵌入感，回忆录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

（三）对史实进行考证、勘误和注释。如：一九三一年九月杭州学生捣毁王文华墓庐事件，误记为一九三四年九月，经考证后，对时间进行勘误；对与王保和大夏有密切关系者，均做人物